

论《维摩诘经》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姜广振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大乘佛典《维摩诘经》在东晋南朝时期广泛流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思想受《维摩诘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亦佛非佛的奇特一生,调和出、处的人生态度和肯定“般若绝境”、“唯务折衷”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维摩诘经; 刘勰; 影响

一、亦佛非佛的一生

刘勰一生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生活在由佞佛者梁武帝统治、佛风甚炽的时代,曾三入佛教名寺定林寺:首入定林约在齐永明八年^{[1] (P68)}(公元 490 年),主要因“家贫”,“依沙门僧佑”(《梁书》本传)^{[2] (P710)};二入定林约在梁武帝天监七年^{[1] (P67)}(508 年),原因是梁武帝“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道宣《续高僧传·僧旻传》)^{[3] (第 12 册 P488)};三入定林约在天监十八年^{[1] (P69)}(519 年),原因“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但“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爇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末期而卒”(《梁书》本传)。^{[2] (P712)}

这种经历使刘勰一生受佛教影响甚大,最明显的是“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2] (P712)}(《梁书》本传),而“《文心》之作,科条分别,往古所无……盖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思理明晰若此”,其原因正是受佛学文理——因明学的影响^{[4] (P728)}(据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注》,另有一说为受小乘空宗《成实论》的影响,在此不作探讨)。

另外,刘勰曾为捍卫佛教地位而作《灭惑论》一文,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道士所作《三破论》给予了强烈的抨击。

然而综观刘勰生平,他的身份基本上是一个俗家居士,而且其作《文心雕龙》的推动力乃是于定林寺内梦遇孔子一事,并引以为荣。《文心雕龙·序志》篇云: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4] (P725-726)}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刘勰入定林寺后,对儒家圣人仍心向往之。诸如此类的字句在《文心雕龙》中并不鲜见,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4] (P725)}、“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原道》)^{[4] (P3)}、“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4] (P720)}

而且,据《梁书》本传记载,刘勰第一次离开定林寺后,自梁武帝天监二年^{[1] (P68)}(503 年)“起家奉朝请”至晚年“出家”,均为积极入世的出仕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他“政有清绩”,得以不断晋升,历任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并与昭明太子过从甚密。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刘勰亦佛非佛的奇特一生。笔者认为,刘勰这种调和出、处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大乘佛典《维摩诘经》思想的影响,以下拟作具体分析。

二、出、处矛盾的消解

大乘佛典《维摩诘经》被称作众经之经,“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绝妙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僧肇《注维摩诘所说经》序)^{[5] (P1)}《维摩诘经》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它的世俗化,这也是其在佛教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原始佛教把出世作为解脱人生苦难的必由之路,大乘佛教兴起后强调普度众生,增加了入世色彩。《维摩诘经》沿着这样的世俗化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塑造了维摩诘这样一个在家菩萨形象。《维摩诘经》中说法的主角不是佛陀本人,而不过是一位在家居士。然而他的佛学修养,神通智慧等均比大乘佛教所崇拜的诸菩萨为强。般若类佛经通过创造入世菩萨形象,把佛教从出世变为入世,《维摩诘经》则通过塑造在家的菩萨形象,进一步由入世发展为处世,推动了处世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而且《维摩诘经》取消了佛国净土与俗世秽土的差别,从而将天

国置于人间。它提出佛国并非远离现实社会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就在现实世间,或者说就是现实世界本身。如《佛国品》谈到当宝积等人向佛请教到哪里去寻找佛国净土时,佛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6] (P103)}这就是说,佛国并不是远离社会现实的彼岸世界,它存在于众生日常生活之中。

另外《维摩诘经》打破了出家和在家的界限,如《入不二法门品》言:“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即为不二法门。”^{[6] (P191)}世间性空,因而它本身也是出世间,只要怀有普度众生的愿望,人生处处皆道场,不必出家离世修行。这样就解决了出家和在家的矛盾。

《维摩诘经》在东汉时有严佛调译本,三国孙吴时有支谦译本,维摩信仰因而逐渐在中土形成,并引发了居士佛教的兴盛。士人对《维摩诘经》的欢迎在《世说新语》一书即有具体的反映: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灰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拊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7] (P227)}

据本条刘孝标注引《高逸沙门传》,这次讲经的内容即为《维摩诘经》。可以看出,《维摩诘经》作为东晋时期佛教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当时僧俗名士清谈和文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众人对于《维摩诘经》的基本内容已经非常熟悉,因而才能对于支遁和许询二人的精彩讲演和驳难心领神会。

从其它有关材料来看,当时僧俗名士研读该经的主要目的是从《维摩诘经》中汲取处世态度的影响,如殷浩就是其中一例。《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7] (P234)}从他对《维摩诘经》中“般若波罗密”一语由嫌多而到嫌少的转变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佛教的经典有了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对自己以往的人生历程有了深刻的反省。

《维摩诘经》在东晋时期能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因为其打通人世、出世界限的思想与当时深受郭象玄学“内圣外王”理论影响的士人之心不谋而合,因而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维摩诘经》后经佛学史上著名翻译大师姚秦高僧鸠摩罗什于弘始八年(东晋义熙二年,406)重译并由其弟子僧肇作注后,在晋末及南北朝士人中更受到极大欢迎,而生活在由佞佛者梁武帝统治、佛风甚炽的时代并尊崇佛教的刘勰,其思想亦不能不受其影响。

再则,《维摩诘经》富有浓厚的文学意味,情节引人入胜,矛盾冲突激烈而且富有哲理,同其它枯燥说理性的佛家经典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特点颇为古往今来的士子文人所钟爱,如唐代好佛的大诗人王维被人尊称为“诗佛”,他甚至有以“维”为名、“摩诘”为字。作为同样好佛的文学理论大家,刘勰决不可能对《维摩诘经》置若罔闻。

可资证明刘勰思想受《维摩诘经》影响的重要证据是其为捍卫佛教而作的《灭惑论》一文。这是刘勰为了反驳道士假张融之名而反佛的一篇驳论文章,主要针对道士《三破论》而发论。所谓“三破”是道教攻击佛教的三条重要材料,即佛教入家家破,入身身破,入国则国破。

刘勰站在佛教立场上给予了反驳,在反驳中反映了他的佛学思想。刘勰《灭惑论》说:

神化变通,教体非一;灵应感会,隐现无际。若缘在妙化,则菩萨弘其道;化在粗缘,则圣帝演其德。夫圣帝、菩萨,随感现应,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来,感灭而名隐;汉明之教,缘应而像现矣。若乃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谓道,似非太上。……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

用, 摩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 假名遂立。梵言菩提, 汉语曰道。其显迹也, 则金容以表圣; 应俗, 则王公以现生。……权教无方, 不以道俗乖应, 妙化无外, 岂以华戎阻情? 是以一言演法, 殊译共解; 一乘敷教, 异经同归。经典由权, 故孔释教殊而道契; 解同由妙, 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 故教分道俗; 地有东西, 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 陶铸群生无异也。(僧佑《弘明集》卷八)^{[3] (第3册 P807)}

在刘勰看来, 儒释合一、僧俗不二, 出家(释家)与处世(儒家)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道俗的问题。入道信佛, 处世奉儒, 二教“弥纶神化, 陶铸群生无异也”, 只是“感有精粗, 故教分道俗”, “梵汉语隔而化通”, 其目的都是规范社会秩序, 训化生民。“异经同归”、“教殊道契”, 二教都是“道”, 的体现, 只是梵言曰“菩提”, 汉语曰“道”, 是名称的不同, 表现有精粗深浅的差别而已。既然儒释合一, 出、处同归, 便没有什么家国之分, 僧俗之别。而入家家破, 入身身破, 入国国破之语则更属危言耸听。

刘勰的这种思想对其《文心雕龙》亦影响至深, 如他在论述文与道的关系时, 常常把“道心”和“神理”并提。“神理”是佛教中的用语, 刘勰认为它和道的含义是一致的。其《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论及的“道”的内容则更为广泛, 他认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乃是对作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哲理之道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这样他就把儒家之道、老庄之道, 佛家“神理”熔为一炉。

联系《维摩诘经》我们可以发现, 《维摩诘经》在家居士观念亦强调“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6] (P119)}主张只要怀有普度众生的愿望, “彼有所作, 举足下足, 当知皆从道场来, 住于佛法矣。”^{[6] (P139)}也就是说, 只要有道心, 人生时时处处皆道场, 因此不必出家求道, 离世修行。这些见解是和刘勰上述思想相一致的。

三、“般若绝境”的赞同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

次及宋岱、郭象, 锐思于机神之区, 夷甫、裴頠, 交辨于有无之域, 并独步当时, 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 贵无者专守于寂寥, 徒锐偏解, 莫诣正理。动极神源, 其般若之绝境乎!^{[4] (P327)}

从中可看出, 滞有和贵无都不能使刘勰满意, 他在“动极神源”之后才发出惟有“般若之绝境”才是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感叹。这种最高的境界在《文心雕龙》中并无明确的解释, 但是在刘勰的《灭惑论》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至道宗极, 理归乎一; 妙法真境, 本固无二。佛之至也, 则空玄无形, 而万象并应; 寂灭无心, 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 莫见其极; 冥功日用, 摩识其然。”^{[3] (第3册 P807)}

所谓“至道宗极, 理归乎一; 妙法真境, 本固无二”, 是说实质是一, 称为二。此说和《文心雕龙·论说》篇非有非无之“般若绝境”均深受《维摩诘经》“不二法门”思想的影响。

所谓“不二法门”, 就是在性空无住的本体实相上取消对立, 消除一切差别。这种认识论、方法论属于般若学思想, 构成了大乘般若学思想的核心部分。《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记载了三十二位菩萨从各个角度叙说非有非无, 不生不灭, 非有为非无为……之类奇妙的“不二”法门, 打破了绝对一元化的世界观, 最后文殊总结性地讲: “于一切法无言无说, 无示无识, 离诸问答, 是为入不二法门。”^{[5] (P194)}接着又问维摩诘什么是“入不二法门”, “时维摩诘默然无言。”^{[4] (P194)}从而达到了“入不二法门”的最高境界, 关于它的内涵, 僧肇注曰: “有言于无言, 未若无言于无言, 所以默然也。”^{[5] (P155)}《世说新语》对此也极力推崇:

支道林造《即色论》, 论成, 示王中郎, 中郎都无言。支曰: “默而识之乎?” 王曰: “既无文殊, 谁能见赏?” 《文学》^{[7] (P222)}

后人则把达摩比作维摩诘知音, 因达摩九年面壁不语。这种超越于有无之间, 言语道断, 心行所灭, 不以文字语言而入不二法门的境地, 正与刘勰追求的反对滞有和贵无的“般若之绝境”相通。

《维摩诘经》的注疏者僧肇是魏晋般若学之集大成者, 他在贵无与崇有问题上采取折中调和态度。他认为, “非有非真有, 非无非真无”(《肇论·不真空论》)^{[3] (第11册 P3)}意思是说, 所谓的“非有”, 即不是真有, 并不是空无所有, 一切现象都不存在, 而是说它不是本体上的实际存在; “非无”, 也不是真无, 什么也没有, 而是“虽有而无, 所谓非有; 虽无而有, 所谓非无。如此, 则非无物也, 物非真物”(《肇论·不真空论》)^{[3] (第11册 P3)}也就是说, 现象虽存在但

还是无, 这叫作不是真有, 只有本体才是真有。本体虽然看不见, 是无, 实际上是有, 这叫作不是真无。这种非有非无的中道观明显受《维摩诘经》不二法门思想的影响, 也间接地肯定了刘勰追求的“般若之绝境”, 对刘勰“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4] (P727)}的文学思想亦有一定影响。

四、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刘勰思想深受《维摩诘经》观念的影响, 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亦佛非佛的奇特一生, 调和出、处的人生态度和肯定“般若绝境”、“唯务折衷”的文学思想。

笔者认为, 人们之所以特别喜爱《维摩诘经》, 除了其经义的新鲜、语言的生动迥异于中土儒道经典, 给人以新鲜的刺激外, 还在于其所宣扬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 既大不同于早期佛教中那种苦行僧式的出家修行方式, 也有别于中土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模式, 因而为中土士大夫信仰佛教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正因如此, 中国佛教历代都有许多高僧喜欢讲述和注疏《维摩诘经》, 且大都是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开创者或代表人物。另外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 虽然由于其“不立文字”的宗旨而没有为《维摩诘经》注疏, 但却最得《维摩诘经》之神髓。禅宗抛弃繁琐的义规, 以佛祖拈花, 迦叶微笑, 强调不立言教, 直指本心, 而且无净土秽土之分和世间出世间之别, 参禅学道者不一定要求出家。这一切与《维摩诘经》的基本思想是相一致的, 因而对古代文人士子的影响更大。唐代大诗人王维、白居易以及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均喜谈禅赋诗, 而且他们的一生也具有“维摩人生”的特点。如王维被人尊称为“诗佛”, 他以“维”为名, “摩诘”为字。白居易亦有诗: “酒肆法堂方丈室, 其间岂是两般身。”(《早梳头》, 《白氏长庆集》卷八) 坐禅与醉酒被其视为具有同样价值作用的事。他追求的是“足适”、“身适”、“自适”的“三适”生活。苏东坡亦曾说: “暂借好书消永夜, 每逢佳处辄参禅”(《书李端叔诗后》, 《东坡集》卷八), 而且苏轼对《维摩诘经》很熟悉, 在诗文中常引为典据, 并以维摩诘自比, 或用来称颂友朋。这一切都证明了《维摩诘经》思想对中土文人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 [1] 牟世金. 文心雕龙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2]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 苏渊雷, 高振农. 佛藏要籍选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4] [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5] [后秦]僧肇等. 注维摩诘所说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 幼存, 道生. 维摩诘经今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7]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笺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Influences of the idea of Vimalakirtinirdesa on Liu Xie
Jiang guang-zhe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super Buddhism confucian classics Vimalakirtinirdesa had widespread and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man both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There appeared obviously three kinds of expressions on Liu Xi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idea of Vimalakirtinirdesa. First, he believed Buddhism but he was not a Buddhist. Second, he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 Buddhist and a man in his family. Third, he approved the literary ideas—“the best wisdom realm” and the eclecticism.

Keywords: Vimalakirtinirdesa ; Liu Xie; Influences

作者简介: 姜广振(1972—), 男, 江苏沛县人,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3 级硕士生,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4-12-25